

中国南方
先秦
考古学术研讨会论文集

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 编

文物出版社

K871.13
7

中国南方先秦考古学术研讨会 论文集

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 编

 文物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中国南方先秦考古学术研讨会论文集 / 浙江省文物
考古研究所编. -- 北京: 文物出版社, 2019. 11

ISBN 978 - 7 - 5010 - 6334 - 5

I. ①中… II. ①浙… III. ①考古—中国—先秦时代
—学术会议—文集 IV. ①K871.414 - 5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9) 第 229160 号

中国南方先秦考古学术研讨会论文集

编 者: 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

责任编辑: 谷艳雪 孙 丹

封面设计: 程星涛

责任印制: 苏 林

出版发行: 文物出版社

社 址: 北京市东直门内北小街 2 号楼

邮 编: 100007

网 址: <http://www.wenwu.com>

邮 箱: web@wenwu.com

经 销: 新华书店

印 刷: 北京京都六环印刷厂

开 本: 787mm × 1092mm 1/16

印 张: 21.75

版 次: 2019 年 11 月第 1 版

印 次: 2019 年 11 月第 1 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 - 7 - 5010 - 6334 - 5

定 价: 268.00 元

本书版权独家所有, 非经授权, 不得复制翻印

论文集编辑委员会

主 任：刘 斌

副主任：方向明 李 晖 郑嘉利

主 编：黄昊德

编 委：田正标 游晓蕾 张 森 罗汝鹏 闫凯凯

南方先秦考古的八点感想四个建议

——在南方先秦考古学术研讨会上的讲话

(代序一)

李伯谦

(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

各位代表，我想大家可能都已经很疲劳了，刚才我听了两个组的交流汇报，我觉得总结得非常好。我自己真是没有什么好总结的了。因为我只听了第一组的，就许宏这个组，那个组就没有听到。所以很难说是个什么总结，谈谈感想吧。

这一次的中国南方先秦考古盛会，我觉得与40年以前在江西庐山召开的第一次中国南方印纹陶学术讨论会，有许多不同。

第一，规模盛大。第一次印纹陶会议，是在“文化大革命”之后，由文物出版社倡议召开的，应该说当时还是很不错，大家参会、讨论都很踊跃。但是比起来，我们这次参会的省份，每个省的不同的地区，不同的单位，大大扩大，涉及的范围，研讨的内容，比那次要多得多，这是一个非常大的不同。当然，毕竟是过了40年，所以说也是应该的。这是第一个感觉。

第二，考古新发现多。在这次会上提交的，讲某个地区新发现的材料非常多，是层出不穷的新发现。我一方面感到很振奋，另外一方面就觉得还消化不了，因为新材料太多了。譬如说，在第一个组听到的关于广东东源大顶山墓地的发现，我觉得就很重要，墓地在广东的东北部，从墓葬和随葬品、玉器、铜器来看，年代应该和浮滨差不多，但是整体面貌来讲有比较大的差异，所以说，我觉得是新东西，那一块过去工作做得很少，从随葬品、墓葬的形制来看，可能受到了浙江、福建的影响，可能还有南边来的影响，这是初步的分析。东源大顶山墓地，这就是一个新的发现，新的突破。类似这样的还有很多，这个刚听过不久，所以印象还很深刻。类似这样的新发现层出不穷，每个省都有，每个地区几乎都有。这是我第二个想说的。

第三，发掘方法讲究。对发掘方法的讲究，比过去要大大地提高。其中给我最深

刻印象的是江苏一个土墩墓的发掘，做得那么细，我觉得这确实从来没有过。我比较注意对土墩墓发掘方法的改进，最早是林留根发掘镇江到溧阳高速公路，配合基建清理了一大批土墩墓。那个方法，我感觉非常好，我记得当时还写过一个读后的评论。这次江苏土墩墓的发掘方法，我觉得比那时更进一步了，这对我们是一个很好的启发。对发掘到的这些遗存，不管是墓葬，还是遗址，方法讲究了，就可能做得很准确，检测过程可能很准确，分析也可能很准确。由于这两个准确，从中提炼出的认识就可能更符合实际，科学性就可能更强。这个给我一个很强烈的印象。当然不光是他，其他很多都注意了，譬如说几个城址的发现、发掘。这是第三点。

第四，有新的见解。新的见解体现在大家不仅对遗存做了发掘，而且都提到通过发掘得出来的认识，我觉得这是很不容易的。过去我们常常像报账一样，从几月到几月在哪进行发掘，发掘墓葬多少个，里头出了哪些东西。至于这些材料反映了什么问题，一般涉及不到，或者非常简单地带而过。我注意到这次会议上，对很多发现大家都谈了他的认识，这是不容易的。就是说，大家通过发掘、调查，对材料进行了消化，消化以后必然会提出一些见解，至于这个见解对不对，拿出来讨论。我觉得这样非常好，比过去是大大地改进，让我印象很深。

第五，分析逐步地细化。比如说张强禄先生讲的“米”字纹陶，通过“米”字纹陶的分析研究，和广东的汉代的政区划分联系起来。因为“米”字纹反映不同区块的不同特点，可能为后来划分为不同的行政区划提供了一个背景。我觉得这就是从器物的研究上升到了社会的研究。这也是我们很重要的发现。类似这样的研究还有，譬如说江苏淹城，徐峰先生通过对淹城的分析，结合文献的记载，提出可能不是一般的城址，可能是在周代出现的一种礼制活动的遗留。不管这种观点对还是不对，提出这个见解我觉得就非常不容易。我们不能看到有城墙，就仅是城，至于这个城是干什么的，什么性质的城，就没有深入的分析。通过比较，细化这种讨论，提出这样一种看法，就标志着我们的学术研究在前进。这是比较细化的问题。

第六，视野开阔。有多篇文章都把我们对于印纹陶、原始瓷等的研究和考古中国大项目联系起来，也是很重要的。考古中国是前几年从新石器时代开始提出来的课题，长江下游、长江中游、河套地区，后来加了一个中原地区。当时考虑起什么题目，在探源工程之后，还想做点工作，不能老在探源工程上加吧，已经十来年过去了。国家文物局说，是不是做考古中国。考古中国究竟是一个什么样的项目？我的理解是，要通过我们的考古工作，考古的发掘、研究，来回答中国起源、形成、发展、走向，应该是这么一个总的目标，和探源有类似之处。后来总结前几年对考古中国这个项目的实施，感觉到范围可能窄了一点，所以提出来要扩大范围，上到旧石器时代晚期，下可能要涉及先秦，南方先秦考古正好是在国家文物局总结前几年考古中国项目提出来

的一个想法。现在我们这个会议提交的一些论文，基本上紧扣这个课题，其中做了比较系统探讨的，比如赵东生先生的文章。总而言之，我们不管研究印纹陶，或者其他什么问题，都不是就事论事，而是与总的目标要密切契合，所以我觉得这个也是非常重要的。

第七，科技手段的运用。科技手段的运用，不仅在发掘过程中、调查的时候、分析这些遗物遗存时用，我觉得还可以再进一步提高。现在来讲，都做得很不错。会议上有几篇对青铜器成分的分析、铸造技术的分析，我觉得比过去要大大改进，这是我们的一个方向。中国考古学要发展要前进，在方法论上，在科技手段上，必然要改进。我觉得这是我们今后要特别应该注意的。

第八，科学严谨。我还注意到，不管研究什么问题，都是从自己熟悉的那一块做起，和周围的相关材料，和不同的地区，加以联系，这是不容易的。任何文化都不是孤立存在的，都是相互有联系的。这个联系有的紧密，有些可能就没那么紧密，但不管怎么说，它们是有联系的。在这次会上，我听到很多发言都把研究放在一个比较大的范围之内进行考虑。虽然都是研究印纹陶，但是不同地区的印纹陶特点不一样，不同地区的印纹陶之间还有互相交流，有融合，甚至有更大范围之间的交流、传播、碰撞。这方面大家也比较注意，这是做科学研究非常重要的一个问题。比较，才能出问题，比较，才能出学问，没有比较，就看不到联系，也看不到问题，所以这方面也是很大进步。总而言之，这次学术研讨会，刚才王结华所长总结的时候说科学，我觉得非常正确。确实，这次研讨会是科学性非常强的一个学术讨论会，也是非常严谨的一个学术讨论会，这个评价非常中肯。这是我对整个会议的一些感想。

当然，还有一点要说的就是，从人员构成来看，年轻的考古工作者、研究人员大大增加。参加过第一次印纹陶会议的大概就我们几位，没有几位了。但这几十年的发展，现在这么多人坐在这个地方，标志着我们中国考古学确实在飞速前进，是非常好的现象。

另外，在充分肯定我们的成绩和收获的基础之上，我想提几个建议。

首先，地层学、类型学方法不能丢。我们做考古，考古学最基本的地层学、类型学方法不仅不能丢，而且应该更加重视。强调这一点很重要，因为有很多科技手段，那么用新的科技手段能不能代替呢？可能在某些方面能代替一点，但是总的来看是代替不了的。通过地层学和类型学的研究，才能对研究的对象有深刻的认识，这不是科技手段可以代替的。所以我想有些问题的解决，恐怕还是要靠最基本的考古学研究方法，比如说我听到关于昆山的发掘，昆山的发掘谈到有马桥、后马桥这样一些概念。马桥文化从命名到现在正好是40年，10月在上海举行了马桥文化命名40年的讨论会。而这次会议上，宋建先生还有陈杰先生都对马桥的发掘研究做了回顾和反思。为什么

我说这个事，就是说这个问题，马桥的问题到现在我都不是太清楚，马桥文化究竟分几期也不知道，后马桥是什么，我也不知道，都用这个词，我觉得可能存在问题。因此，如果我们发掘个典型遗址，把马桥文化彻底梳理一下，什么叫马桥文化？是以马桥遗址当时发掘的第4层为代表叫马桥文化？还是后来有哪个类似遗址叫马桥文化？这些问题都是可以解决的，靠地层学、类型学的深入研究来解决。昆山的发掘很重要，希望通过发掘，明确这些问题，不然马桥文化可能拉得太长了，从夏代一直到商末周初，这么长的时间实际上是不可能的，我觉得是应该有划分的。至于划分几段，可以分为几个文化或者类型等，那是研究的结果，但是运用地层学、类型学手段，把马桥文化彻底做一做，我觉得很有必要。类似的这样的研究，还有其他几个。这是第一个问题。

第二，抓住苗头抓住重点不放手。我想提个建议，现在新的发现层出不穷，非常多，好的遗址，好的苗头出来了，如何紧紧抓住不放？要做到基本清楚，在学术史上占有一个重要的地位，要达到这个程度才放手，特别是一些重要的城，昆山、安吉古城、小古城，类似这样的，其他省也有。这些遗址要紧紧抓住，不能蜻蜓点水，这种教训太多了。我们做断代工程，到探源工程的时候，对中原地区夏文化的研究过程中，非常遗憾的就是王城岗遗址。当时安金槐先生做了一个城圈出来，里边基本没怎么动，觉得能解决问题了。实际上，现在看来，问题很多，一个很重要的问题就是，有了城圈以后我们很高兴，那里头有什么，就没有别的什么东西了？这个教训应该吸取，抓住不放，不管现在做几个新的东西，要有人一直盯着，持之以恒，才能最后拿出真凭实据，使提出的论据更加充分。前不久在河南鹤壁召开黄淮七省考古论坛学术讨论会，那会当然也很好，正好是在鹤壁附近辛村。大家知道，1931年郭宝钧先生在那挖掘的浚县辛村，除了发现墓葬，又发现了铸铜的遗址、制骨的遗址。墓葬大部分是西周的，但也有一些是商代的。当然会提到，有没有城？因为那是卫国的墓地，是康叔的封地，一定会有城，地位当然非常重要。但是有没有计划？到那安一个点，彻底做下去，做清楚，可能还是个问题。类似这样的，我觉得我们一定要下决心，蹲点，取得突破。这是我想说的抓住苗头，抓住重点不放的问题。

第三，学术要交流。这次会议是一个很好的交流，范围很大，开这么一次会议也不容易。小型的交流，首先从地区开始，经常交换些意见，然后省内不同形式的交流，互相启发，就会爆发新的火花，而不是孤立的，我挖我的，你挖你的，老死不相往来，这肯定是不行。我们这次交流很广，以南方先秦考古为题，除了中南、东南、南方，还有西南地区，贵州、四川、重庆，这是很有必要的。学术问题就是互相启发的，说不定哪一天你听到他讲了个什么东西对你就会有启发，所以我觉得不停不断地交换意见进行交流是很重要的。

第四，注重年轻人的培养。现在有这么多的年轻人登上了考古舞台，今后就是他们的天下。一个省的考古所，一个地区的研究所，怎么样有意识来培养这些年轻人，加大任务量使用他，同时也要多创造条件，让他多参加学术活动，这样可能会成长得更快一点。因为实际上在不同的地区都会有这样的情况，十来年可能就会成长出来一批考古的精英人才。这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你不理他，他可能就自己成长起来，如果稍微扶持他一下，就可能成长得更快。

我参加这个会议是非常受教育的。本来，这么大年龄到这凑什么热闹，其实从我的内心来讲，来了以后学到很多，听到了很多新的材料，思考了很多新的问题，所以我也特别感谢浙江省考古所、浙江省文物局，特别感谢在座的各位，使我受到了这些新的教育。谢谢大家！

总结过去 开拓未来

——在中国南方先秦考古学术研讨会上的讲话

(代序二)

许常丰

(浙江省文物局)

尊敬的李伯谦先生，各位来宾、学者，女士们、先生们：

大家好！非常高兴参加此次中国南方先秦考古学术研讨会。首先，受我们柳河局长委托，在此，我谨代表浙江省文物局，对此次学术研讨会的召开，表示热烈的祝贺！对各位嘉宾的与会，表示诚挚的欢迎！

浙江素有“文物之邦”美誉，文物资源丰富，文化底蕴深厚，全省现有世界文化遗产2处，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231处，其中古遗址、古墓葬50余处。多年来，浙江的考古工作主动融入我省改革开放和经济社会发展进程中，配合交通设施、能源设施、水利枢纽和城市建设而进行的抢救性考古工作如火如荼，结合课题研究而实施的主动性考古科研工作有序推进，考古工作成绩显著，硕果累累，特别是先秦考古工作始终是稳步向前的。如20世纪七八十年代，我们以土墩墓为主要研究对象，建立起了浙江夏商至春秋时期的年代框架，90年代后期，我们发掘了印山越国王陵，揭开了越国王陵的神秘面纱。21世纪以来，浙江的先秦考古工作以课题为导向，制订长期、系统的考古工作规划，在国家文物局的支持下，在瓷之源、越国王陵及贵族墓、安吉古城、湖州昆山遗址、安吉小古城遗址等考古工作都取得了重大的收获。确立了东苕溪流域在中国瓷器起源上的重要地位；基本搞清战国时期越国王陵的分布区域；建立起了以安吉古城为中心，涵盖城址、墓葬、周边聚落遗址的大遗址格局；确定了昆山遗址、小古城遗址是商代浙北地区的中心聚落遗址。目前，安吉古城遗址已被列入国家大遗址，安吉古城国家考古遗址公园也已立项。

应该说，目前有关浙江先秦考古发现和研究所取得的成绩，离不开各级领导的关

心和支持，更得到了各位专家学者的悉心指导，并凝聚了你们的无私心血。在此，我向所有关心、支持浙江文博事业发展的各级领导、各界朋友、各位专家学者，致以崇高的敬意和诚挚的谢意！

今天，我们相聚杭州，总结南方先秦考古所取得的成绩，探讨南方先秦考古学文化研究中诸多学术问题，必将对南方先秦考古文化研究产生深远的影响。同时，也请各位专家学者多为浙江先秦考古工作献言献策。

最后，预祝研讨会圆满成功！

谢谢！

目 录

代序一 南方先秦考古的八点感想四个建议	李伯谦	i
代序二 总结过去 开拓未来	许常丰	vii
马桥文化研究的反思	宋 建	1
陶冶吴越		
——简论两周时期吴越的生业形态与资源互动	张 敏	10
关于土墩墓“祭祀器物群”的一点思考	陈元甫	22
广东印纹陶及原始瓷发展脉络	李 岩	33
滇东黔西地区先秦时期的族群文化交流	张合荣	56
论商王朝对长江中下游地区的经略	赵东升	67
试论中国东部沿海半月形文化传播带	吴 桐	79
宁波地区商周考古的新发现与新认识	王结华 张华琴	114
台湾岛几何形印纹陶的起源及相关问题	付 琳	126
从东周于越贵族墓葬形制看越地文化变迁	曹 峻	134
印纹陶原始瓷视野下的三代南北文化交流互动研究	黄昊德	147
浅议德清战国墓随葬原始青瓷文化特色	周建忠	165
坑刀山窑址群出土陶瓷器的科技分析		
——兼论闽浙赣商代原始瓷的两种制釉技术		
.....	周雪琪 吕兹树 羊泽林 牛健哲 崔剑锋	172
刻纹铜匜说晋吴		
——兼谈东周刻纹铜匜的演变和传播	田建文	187

湖南出土青铜四羊方尊与常宁方尊研究

——再论商代青铜器南北关系	苏荣誉 吴小燕 袁 鑫	205
浙江发现的几件徐舒青铜器	俞珊瑛	227
越国的王者之剑	娄 烈	234
一类带有特殊纹饰的铜戈	陈小三	244
试论环太湖地区出土石戈	毛 波	251
绍兴出土玉石兵器的调查与初步研究	刘 侃 吴丝禾	258
殷墟南区布局研究	孔德铭 于 浩	274
“中国南方先秦考古学术研讨会”纪要	游晓蕾 谢西营 张 森 张馨月	285

马桥文化研究的反思

宋 建

(上海博物馆)

马桥文化在学术领域的重要性不能同良渚文化相比,甚至可以说马桥文化所代表的阶段是环太湖地区两个社会发展高峰之间的中间期。但是随着田野考古的不断深入、发掘资料的持续积累和研究领域的进一步拓展,马桥文化越来越凸显其重要性。2018年是马桥文化命名40年,回顾以往研究,有以下四个方面值得反思。

一 考古学文化的命名

1978年发表了20世纪60年代马桥的发掘报告,全新的材料立即引起学术界的关注。在1978年8月召开的“江南地区印纹陶问题学术讨论会”上,蒋赞初先生首次提出了“马桥文化”的概念,并为马桥文化打上双引号,足以显示先生的细心与慎重^①。三年后的“江苏省考古学会第二次年会暨吴文化学术讨论会”上,20世纪60年代马桥遗址的发掘者黄宣佩和孙维昌先生撰文《马桥类型文化分析》^②,对文化名称有三种不同提法:一是马桥类型,如第一节名为“关于马桥类型的特征、年代和分布范围”;二是马桥类型文化,如文章开头的“被称为马桥类型文化”;三是马桥文化,如第三节中提到“马桥文化的延续是亭林类型”。虽然第三种提法在文中出现的次数最少,但是作者显然是将其作为独立的考古学文化对待,而非第二层级的“类型”。文中出现几种不同提法可能反映了认识的不确定性,或为发掘者的学术谨慎。此后,马桥文化被大多数研究者认可,并拿去了定名初期因谨慎而加上的双引号。马桥文化以20世纪60年代发掘的马桥中层(四层)为代表,因而有马桥中层或马桥四层文化的概念,并被个别研究者长时期习惯性沿用。

① 蒋赞初:《关于长江下游地区的几何印纹陶问题》,《文物集刊(3)》,文物出版社,1981年。

② 黄宣佩、孙维昌:《马桥类型文化分析》,《江苏省考古学会第二次年会暨吴文化学术讨论会论文集(第一册)》,1981年;又载于《考古与文物》1983年第3期。

高祭台类型是和马桥文化相关的另一个名称,牟永抗先生于中国考古学会 1981 年年会上提交的一篇主要论述浙江新石器文化的论文中首次提及,之后又专题撰文全面论述^①。在后文中,牟永抗先生指出,“对这类遗存不能排除进一步划分类别的可能性,高祭台的称谓也只能是暂时的代称,随着发掘和研究的深入,今后可以重新命名。”可见牟永抗先生是将高祭台类型作为考古学文化的暂时称谓。牟永抗先生虽然指出了考古学文化的分布范围不等同于现代行政区域,但是他所论述的高祭台类型基本不出浙江省界。

在时间方面,高祭台类型是“青铜时代的文化遗存”,涵盖浙西南夏商时期的着黑陶和更大区域的周代土墩墓、土墩石室。牟永抗先生也使用马桥类型的概念,认为其分布于上海近郊地区,“可能是和高祭台类型早期同时并存的两个类型”。但是后来不晚于 1999 年,牟永抗先生有了不同的认识,在回忆 20 世纪 50 年代一次配合浙江大学新校舍的抢救性考古发掘时提及,出土遗存“现在看来既有马家浜文化的遗物,也有良渚文化和马桥文化的堆积”^②。学界对高祭台类型这一名称的认同者甚少,目前所见只有 2006 年出版的《昆山》发掘报告仍然沿用。

另外还有陆建芳先生提出了马桥—肩头弄文化的名称,这一认识的核心是,20 世纪 60 年代马桥第四层文化遗存由五种文化因素构成,其中一种代表马桥类型文化,占主导地位,它同肩头弄期遗存属同一性质,是同一个考古学文化^③。

今天反思马桥文化的命名过程可以认识到,一个考古学文化的命名首先必须有丰富的发掘材料,并且尽早尽完整发表报告。马桥遗址发掘于 1960 和 1966 年,地层堆积清晰,文化遗存保存较好,发掘材料得到及时整理和研究,十年动乱结束后不久即发表报告,当年即提出“马桥文化”的概念。而淳安高祭台遗址于 20 世纪 50 年代进行过两次发掘,直到 2005 年才发表报告^④。另外据牟永抗先生的《高祭台类型初析》,高祭台遗址的发掘部位属于次生地层。这些决定了高祭台并不具备考古学文化命名的基本条件。再者,关于考古学文化分布范围和现代行政区域的关系,应该说当时是不够清晰的。牟永抗先生在 2005 年发表 1958 年高祭台第二次发掘总结的后记中回顾了当时的思考,“如果说在高祭台发掘的那个阶段曾经在我们观念中模糊地出现

① 牟永抗:《浙江新石器时代文化的初步认识》,《中国考古学会第三次年会论文集(1981)》,文物出版社,1984 年。牟永抗:《高祭台类型初析》,《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学刊》,科学出版社,1993 年。

② 牟永抗:《关于良渚、马家浜考古的若干回忆——纪念马家浜文化发现四十周年》,《农业考古》1999 年第 3 期。

③ 陆建芳:《初论马桥—肩头弄文化》,《东南文化》1990 年第 1 期。

④ 新安江水库考古工作队:《浙江省淳安县进贤高祭台遗址第一次发掘报告》,《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学刊》第七辑,杭州出版社,2005 年;《浙江省淳安县进贤高祭台遗址第二次发掘总结》,《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学刊》第七辑,杭州出版社,2005 年。

过江苏、浙江和安徽诸省的边界不一定是考古学文化区分及其年代分期的标准，考古学文化的某些因素和特征，可以穿越省界进行传播或交流等等一丝的闪念……”因此，高祭台类型的地域为浙江省界所限，排斥了其他地区的同类文化。另外高祭台类型延续太长时间，包含多种不同属性的考古学文化，也是命名不被绝大多数研究者认同的原因。

对于一种新发现的文化遗存命名必须慎重，不应该在认识不明确时仓促提出文化命名，也不必以加引号表示不确定性，可以先以某某遗存称之，待认识比较明确后再命名为文化。随着研究的深入可以再区分类型，作为第二层级。另外还应该避免文化类型、类型文化、某层文化这样具有歧义的用语。

陆建芳先生的命名方式是一种尝试，但是可操作性不强，因此几乎没有认同者。

二 马桥文化的探源

1978年以来，马桥文化来源即成为一项关键研究内容。大致相同地域分布的良渚文化是马桥文化的先行者，因此探源从良渚文化入手，绝大多数研究者或多或少都将良渚文化因素作为来源之一或所谓“影响”之一。随着钱山漾文化和广富林文化的确认，张忠培先生指出，“以往基于良渚文化—马桥文化这一考古学文化序列认识的基础上提出的任何论述，都将随之于现实的学术研究中失去存在的空间”^①。今天我们反思马桥文化的探源过程，对于改善乃至修正相关研究的方法论是很有必要的。

20世纪80年代马桥文化的研究者屈指可数，除了黄宣佩、孙维昌先生，只有李伯谦先生和我数人，且观点大致相同，均将良渚文化作为马桥文化的来源之一，同时也有非本地文化因素的来源。我将良渚文化和浙南闽北地区以江山肩头弄第一单元遗存为代表的文化视为两个主要来源，并特别指出，由于马桥文化和良渚文化的分布区域重叠，先后生活于同一地区甚至同一地点，从这个意义上说，马桥居民应是良渚居民的后继者。这一阶段的研究者在探寻文化来源时比较关注同一地区先行者和后来者的文化关联性。

20世纪90年代，马桥文化的外来性被放到突出的位置，提出了“文化断层”和“文化缺环”的概念。张敏先生认为，良渚文化到马桥文化之间出现了文化断层，尽管马桥文化中含有少量的良渚文化因素，然而马桥文化绝不是良渚文化的后继，而是从南方迁来的肩头弄类型文化填补了良渚文化区的空白，进而发展演变为马桥文化。^②我

① 张忠培：《序》，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湖州市博物馆编著《钱山漾——第三、四次发掘报告》，文物出版社，2014年。

② 张敏：《华夏文明起源的假说》，《东南文化》1990年第4期。

的认识是,从良渚文化到马桥文化有两个重要因素发生作用,社会因素是外来文化的进入,生态因素是自然环境的变异^①。“马桥文化替代良渚文化只延续了一部分良渚文化因素,却融入了大量非当地传统的新文化因素,其中最多的是肩头弄文化遗存,其含量比例甚至超过了良渚文化因素,还有二里头文化、商文化、岳石文化和湖熟文化早期因素。这些新的文化因素,有的是外来文化的传入或影响,有的是文化的交互作用。马桥文化在融合了多种来源的文化因素之后,形成了有别于其他文化的自身特色。因此从总体上看,它与良渚文化有相当大的差别,形成文化缺环”^②。

实际上,考古发掘资料中马桥文化同当地文化比较直接的关联早有发现。年代上的关联是1959年发现、1961年发掘、1962年发表的广富林,发现了广富林文化的陶鼎,但当时归之于良渚文化。年代和文化因素的关联则是1934年发现、1936年发表和1956、1958年发掘、1960年发表的钱山漾,发现了方格纹、竹编纹(席纹)等,并在1978年“江南地区印纹陶问题学术讨论会”上受到关注。当时也将钱山漾的相关遗存归于良渚文化。2000年,确认了广富林遗存(2006年正式提出广富林文化)。2003年广富林发现了包含鱼鳍形足、细颈鬲的遗存晚于良渚后期较晚阶段墓葬的层位关系。2005年钱山漾遗址发现钱山漾1期—钱山漾2期—马桥文化之三叠层,并于2014年正式提出以钱山漾1期为代表的钱山漾文化。这些发现使环太湖地区马桥文化之前的文化年代关系较之以往更加清晰,从而为探讨同一地域文化的关联性找到新的切入点。此后,马桥文化起源的本土属性再次受到关注。

曹峻先生认为,太湖地区传统的文化因素在马桥文化中占有绝对主要的地位,其所论本地传统因素不仅有年代略早的广富林文化,也有更早的良渚文化,即马桥文化主要源自所谓地域传统。另两个来源是南方几何印纹陶因素和北方因素包括二里头文化、岳石文化等,但都不是马桥文化的主要构成^③。

另一方面,马桥文化源自浙南闽北地区的观点受到强烈质疑。焦天龙先生将浙南闽北的文化称之为葫芦山文化,认为马桥文化同葫芦山文化的器物群差异极大,既不是同一个文化,也不存在前后传承关系。马桥文化很可能主要是外来北方文化因素与环太湖地区原有文化的混合变化体,也接受了来自南方的一些影响^④。

今天反思马桥文化的探源过程,以上提出不同观点的研究者的方法论基本相同,着重于文化因素的分析,只是研究材料的来源有所不同,对材料的观察视角有所不同,前者主要是福建地区的新材料和环太湖地区2000年以后的新发现。研究结论从20世纪

① 宋建:《良渚文化向马桥文化的演化过程初探》,《上海博物馆集刊》第五期,上海古籍出版社,1990年。

② 上海市文物管理委员会:《上海市闵行区马桥遗址1993~1995年发掘报告》,《考古学报》1997年第2期。

③ 曹峻:《马桥文化再认识》,《考古》2010年第11期。

④ 焦天龙:《论马桥文化的起源》,《南方文物》2010年第1期。